

## 【论 文】

# 民族关系体验与民族交流：

## 凉山州的汉族与彝族学生

汪丽娟<sup>1</sup>

### 一、导论

中国自古以来便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享有丰富的文化多样性。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前苏联民族政策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决定进行民族识别，旨在弄清楚各个不同文化人群的民族成分。法国汉学家白娅莉（Béatrice David）曾在文章中提到：“中国的民族识别政策在将个人归并到官方民族称谓的过程中也同时衍生出了很多新的族群身份（*identité ethnique*）。在中华民国时期的五族（汉，满，蒙，回，藏）的基础之上增加了51个新的群体。然而，这56个群体的统一又构成了一个新的国家民族‘中华民族’。所以，实际上中国50年代开始的民族识别首先是要求将地方的群体归入汉族与‘非汉族’这两个大类。然后在‘非汉族’这一大类中再区分汇总并冠之以官方认定的民族称谓<sup>2</sup>。”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识别”的过程不仅仅是一个对多元文化的分类过程，它同时也会加强被“识别”族群成员的族群认同。“如我国西北地区的保安族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基本上认同于回族，在被政府部门正式‘识别’为一个独立族群并建立了自己的自治县之后，保安族自身的族群意识和族群内部认同明显加强<sup>3</sup>。”美国彝学家斯蒂芬·郝瑞在谈中国的民族识别问题时也同样认为：“不论当年民族识别的依据如何，各民族已成了民族与区域政策中的一个真实的统一体，过去没有认同的民族，如今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发展出了认同。云南中东部的撒尼人和四川凉山的诺苏人都已经知道自己是彝族，并且当他们用汉语说自己的族称时，都称自己是彝族<sup>4</sup>。”

除此之外，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对中国56个族群<sup>5</sup>“识别”和“制度化”的过程也同时是中国55个少数民族<sup>6</sup>的族群身份“客观化”的过程。北京大学马戎教授指出：“在全体国民的身份中正式地明确每个人的‘民族成分’，而且使之固定化，做出这种制度性安排的理论基础是为了表现并贯彻‘民族平等’政策，避免少数民族成员由于担心受到歧视而不敢表明自己的族别，而实际操作方面的考虑是为了落实政府对少数民族的各项优惠政策，因为不明确人们的‘民族成分’就确定不了落实政策的具体对象。但是必须指出，这种制度性安排无疑会唤醒以及强化人们

<sup>1</sup> 法国巴黎第七大学和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中国近现代研究中心联合培养博士生。

<sup>2</sup> David B., « le rôle des mythes d'origine dans la représentation des ethnicités han et zhuang en Chine du Sud », in *Journal des anthropologues*, 1998.

<sup>3</sup> 马戎,《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第74页。

<sup>4</sup> 斯蒂文·郝瑞著,(巴莫阿依、曲木铁西译),《田野中的族群关系与民族认同---中国西南彝族社区考察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第4页。

<sup>5</sup> 鉴于近年来学界对“民族”,“少数民族”和“中华民族”这几个词汇的讨论,本文认为北京大学马戎教授的观点既能从民族学的角度全面体现中国民族现状,也能从社会政治学方面避免许多现行政策可能带来的弊端。参见马戎,“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民族问题的‘去政治化’”,《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第122-133页。

<sup>6</sup> 同上。



的‘族群意识’，这种把各族群成员相互清晰地区别开来的做法，显然不利于族群之间的交往与融合”（马戎，2004：94）。而且，“族群优待政策，在具体实践当中是一种资源分配的不平等政策”（马戎，2004：97）。在中国，“族群优待政策则是占优势的族群（汉族）通过对其他少数族群的优待而逐步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在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的族群差别的手段”（马戎，2004：97）。中国共产党“实行这样一些照顾性政策的目的是想淡化族群差异，缩小族群差距；但是其结果很可能反而会推动少数族群的自我凝聚、强化其整体意识和进行社会动员。”（马戎，2004：97）

斯蒂芬·郝瑞从族群关系的角度也做出了相同的论断。他认为：“现实中的族群作为一个政治与经济的集合体，其界定在很大程度上不仅仅依据其内部共同的血统与共享的文化，更多的是依据其外部与其他族群的关系和与国家的关系。正是族群间的相互关系使得族群性在各族群成员中显示出重要性<sup>1</sup>。”

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中国政府制定的民族政策，无论其出发点何如，执行方式何如，都无可避免地产生并加深了被“识别”和“制度化”的族群成员的族群身份认同。这种认同在与某些特定的民族优惠政策结合时，很可能会成为影响族群关系的不利因素。在此，我们希望通过凉山州部分汉族和彝族学生关系的调查，来了解自 50 年代以来的民族政策对族群身份认同和族群关系的影响。

凉山州是中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根据凉山州 2011 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sup>2</sup>的统计结果，这个州现有的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 53.5%，其中彝族人口占 50.01%。但是凉山州 1 市 16 县彝族人口的分布很不均匀。大部分彝族聚居在山区和二半山地区。比如，凉山州州府所在地西昌市的彝族人口只占 22.5%<sup>3</sup>，而距西昌市 114 公里的布拖县的彝族人口却占全县总人口的 94.7%<sup>4</sup>。2010 年我们选择了西昌市的 4 所中学做调查。之所以做这个选择，一是因为我们可以国内做调查的时间相当有限，客观条件不允许我们在其它县份上做进一步的调查；但更重要的原因是西昌市的这四所中学各具特色：第一所中学规定必须招收至少 50% 凉山州各个县考上来的少数民族学生；第二所中学主要的招收对象是西昌市 13 个乡镇的少数民族学生。另外两所中学虽然没有招收少数民族学生的任务，但还是有为数不多的少数民族在此就读。而且这两所中学一所为乡村中学，另一所是城市中学。所以，这四所中学的学生无论是从社会经济条件还是从族群混合程度上都相当具有代表性。由于我们采访中彝族以外的少数民族学生比例很小，所以我们研究的对象主要是汉族和彝族学生。

格莱泽 (N. Glazer) 和莫尼汉 (D. P. Moynihan) 在《族群》(ethnicity) 一书中多次提到“族群分层”(ethnic stratification) 这个术语。族群分层“分析的对象是不同族群集团之间由于其结构性差异所引起的不平等，目的在于考察一个社会的‘社会分层’结构当中是否含有一定程度的族群背景，社会的不平等是否反映的是族群之间的不平等，各族成员是否存在相同的社会流动机会<sup>5</sup>。”在此基础上，我们假设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彝族学生和汉族学生在学校有没有族群混合的经历及其混合的程度对他们接受异文化的程度和民族关系都有很大的影响。因此，我们分别在这 4 个族群混合度不同的高中做了问卷调查。这篇文章的内容主要是基于对这 4 所高中汉族和彝族学生所做的调查问卷结果的分析。另外，我们还会利用一些在西昌市学校以外所做的半结构式访谈的内容对相关问题做补充。通过这些分析，我们希望能够评估以高中学生为主的社会主体对“民

<sup>1</sup> 斯蒂文·郝瑞著，(巴莫阿依、曲木铁西译)，《田野中的族群关系与民族认同——中国西南彝族社区考察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第 22 页。

<sup>2</sup> <http://www.lsz.gov.cn/2011xxgk/next/e06b6b2b-1dd9-4dbc-941f-053e14900f47> (20/03/2013).

<sup>3</sup> <http://xc.lsz.gov.cn/shownews.aspx?id=39849> (20/03/2013).

<sup>4</sup> <http://www.scxty.cn/lsz/Template/12/detail.aspx?wid=2799&cid=20902&id=187732> (20/05/2013).

<sup>5</sup> 马戎，《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第 232 页。



族”这个官方认定的族群身份的认同程度。同时，我们也反思这个民族标签是否会加深各个族群之间的界限。另外，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对“民族友谊”、“异文化了解程度”和“跨民族婚姻态度”这几个变量的分析，弄清楚这些官方认定的不同族群身份的汉族和彝族学生对异文化的“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过程。

## 二、中国社会中的“文化碰撞”（rencontre des cultures）和少数民族

### 2.1 中华文明的多元性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文化多元的国家，也正是这种文化多元性造就了经久不衰的中华文明。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各个地方的人群之间就有不同程度的接触。这种接触时而以武力征伐的形式出现，时而以文化融合的形式出现。直到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的到来，中国才告别了帝制时代，开始走上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征程。历史学家们都一致认同中国历史上的这种文化多元性对中华文明构建所做出的重大贡献。法国的中国历史学家 J. Gernet 就这样写道：“一千多年前，中国的族群和文化多元性都比今天要普遍。那时，长江以南还居住着众多的族群，可是现在仅存为数不多的几个了：讲泰语和老挝语或者使用汉语方言的傣族人、从属于藏缅语系的人群、苗族和瑶族……中华文明在它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地整合其它不同的文化。在这个从未中断过的文化接触的过程中，没有任何文化能够孤立于中华文明的影响之外：北方草原上操土耳其语、蒙古语和满语的游牧民族、中藏边界上的山民、扬子江畔的渔民、中国南边、西南边的非汉族和中亚居住在绿洲边的人民……<sup>1</sup>”。因此，与其说中国的各族群之间是一种马赛克式的共存方式，不如说他们在中国这片共同的土地上杂居、融合更为准确。考古学家们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就是这个融合过程的鉴证。当然，想要完整地重现这段历史文化融合过程似乎显得有点异想天开，因此我们便只能从族群关系这个角度去把握了。

### 2.2 采访对象的特征

在分析族群关系之前，我们首先介绍在本次调查中采访对象的特征。研究族群之间的结构性差异时常用到的指标有：“（1）劳动力的行业结构；（2）人口城乡比例；（3）平均受教育水平；（4）劳动者就业率；（5）职业结构；（6）收入结构与消费模式等等”（马戎，2004：232）。鉴于我们本次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已经考入普通高中的彝族和汉族学生，而且我们采用的研究方法是调查问卷采访。相对个人访谈来说，问卷调查本身具有局限性，采访者不能更深入、全面地了解被采访者的个人经历及家庭状况。但是，被采访的这四所学校学生不同的族群混合度和其家庭经济收入的差距让我们不仅能够比较这两个族群之间的结构性差异，而且还能从某种程度上量化各个族群内部成员之间的“社会分层”<sup>2</sup>。

为了了解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我们在调查问卷中提出的问题是：“你们家的家庭年收入是多少？”我们给了学生五个区间选项：小于5000元、5000到1万元、1万到2万元、2万到4万元和4万元以上。虽然我们采访的学生并不一定知道他们家庭具体的年收入是多少，但是他们家庭的生活和消费的方式直接影响他们对其家庭收入的定位。在此，我们以表格的形式来具体表示各个学校的族群混合度以及它们各自招收的彝族和汉族学生之间的社会经济差异。从社会学的角度，我们不便在这儿直接使用被采访学校的名称。因此，我们决定使用以下四个替代名：汉族城市高中，汉族农村高中，混合民族高中和零混合度民族高中。这四个替代名虽然稍显冗长，但是他们能够具体体现这四所学校招收学生的特点。

<sup>1</sup> Gernet J., 1968, article “Chine”, *Encyclopaedia Universalis*, vol. 4, p. 263.

<sup>2</sup> “社会分层是各类人的结构性的不平等，人们由于在社会等级制度中的地位不同而有着不同的获得社会报酬的机会。（罗伯逊，1990：301）”（参见马戎，2004：232）



表一：各学校彝族和汉族学生的族群混合度和家庭经济状况

年收入（元）	民族（%）	1-5000 (1)	5001-10000 (2)	10001-20000 (3)	20001-40000 (4)	大于40000 (5)	总数
汉族城市高中： （特低混合度）	汉族： 93,7	(21) 15,7 %	(31) 23,1%	(21) 15,7 %	(29) 21,6%	(29) 21,6%	(131) 100%
	彝族： 6,3	(2) 22,2	(1) 11,1	(0)	(2) 22,2	(4) 44	(9) 100
	总计： 100	(23) 16,4	(34) 24,2	(21) 15	(31) 22,1	(33) 23,6	(140) 100
汉族农村高中： （低混合度）	汉族： 83,5	(28) 32,6	(23) 26,7	(20) 23,3	(11) 12,8	(2) 2,3	(84) 100
	彝族： 16,5	(11) 64,7	(2) 11,8	(1) 5,9	0	(1) 5,9	(15) 100
	总计： 100	(39) 39,4	(25) 25,2	(21) 21,2	(11) 11,1	(3) 3	(99) 100
混合民族高中： （汉族学生居多）	汉族： 59	(23) 31,5	(18) 24,7	(9) 12,3	(12) 16,4	(11) 15,1	(73) 100
	彝族： 41	(22) 42,3	(8) 15,4	(10) 19,2	(8) 15,4	(2) 3,8	(50) 100
	总计： 100	(45) 36,6	(26) 21,1	(19) 15,4	(20) 16,3	(13) 10,6	(123) 100
零混合度民族高中：	汉族： 0	-	-	-	-	-	-
	彝族： 100	(60) 60,6	(17) 17,2	(12) 12,1	(6) 6,1	(1) 1	(96) 100
总计	汉族 （总数）	(72) 25	(72) 25	(50) 17,4	(52) 18	(42) 14,6	(288) 100
	彝族 （总数）	(95) 55,9	(28) 16,5	(23) 13,5	(16) 9,4	(8) 4,7	(170)
	总数	(167) 36,4	(100) 21,8	(73) 15,9	(68) 14,8	(50) 10,9	(458) 100

从总体上看，在这个表格中超过三分之一（36.4%）的学生家庭年收入小于5000元，处于贫困状态，只有接近11%的学生的家庭年收入大于4万元，58.2%的学生的家庭年收入小于1万元（列（1）与列（2）之和）。而且，彝族学生家庭的贫困程度大于汉族学生：55.9%的彝族学生的家庭年收入小于5000元，而只有25%的汉族学生家庭处于相同的贫困状态。与之相反，家庭年收入大于4万元的彝族学生比例远远低于同等水平的汉族家庭。

汉族城市高中的彝族和汉族学生混合度很低。就读于这个学校的学生主要是汉族，140个被采访的学生中只有9个彝族，占6.3%。同时，这个学校家庭富裕学生的比例也最大，23.6%的学生家庭年收入超过4万元。另外，9个被采访的彝族学生中有6个的家庭年收入大于2万元。这表明就读于这个汉族城市高中的彝族学生虽然数量上很少，但都属于家庭富裕的学生。他们和汉族同学在社会经济条件上几乎没有差距。

与此同时，就读于汉族农村高中的学生的构成情况和汉族城市高中的相比差异就比较大了。首先，从数量上讲，虽然就读于汉族农村高中的汉族学生的比例仍占大多数（83.5%），但是与汉族城市高中的汉族学生相比还是要相对少一些。另外，这个学校汉族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远远比汉族城市高中的汉族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差（家庭年收入小于5000元的汉族学生比例相差16.9个百分点）。至于这个学校的彝族学生，从数量上讲，他们和汉族城市高中的彝族学生一样占少数，可是他们的家庭经济状况却和前者无法相比。汉族农村高中的彝族学生家庭年收入少于5000元的学生数量（64.7%）是汉族城市高中处于同等条件下的学生数量（32.6%）的两倍。而且，我们还注意到这个学校彝族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是4所高中里最差的（64.7%的彝族学生家庭年收入少于5000元），甚至比零混合度民族高中的彝族学生家庭经济状况还要差（60.6%的彝族学生

家庭年收入少于 5000 元)。

至于混合民族高中，首先从数量上来看，就读于这个学校的汉族和彝族学生的比例几乎相当（51%的汉族学生比 49% 的彝族学生）。其次，这个学校家庭年收入少于 5000 元的学生比例相比汉族农村高中同等条件下的学生比例稍微小一些（36.6%比 39.4%）。因为尽管这两个学校汉族学生家庭年收入小于 5000 的学生比例相当，但是与汉族农村高中的彝族学生相比，混合民族高中的彝族家庭经济状况很差的学生比例相对较小（42.3%比 64.7%）。

在对以上 4 所中学的彝族和汉族学生家庭经济状况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可以看出族群性这个因素和社会经济状况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首先从整体上来看，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的汉族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都比彝族学生要好。其次，城市的汉族和彝族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都比农村的汉族和彝族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好。另外，家庭经济状况最差的彝族学生要么集中在主要招收彝族学生的高中，要么散布在条件较差的汉族农村高中。这说明在彝族这个族群内部存在着严重的社会分层现象。

我们知道在这 4 所中学里，只有零混合度民族高中招收的学生完全是彝族。其它 3 所高中里的汉族学生都占多数，但是比例各不相同。那么，这种不同的族群接触环境会不会使彝族和汉族学生对“民族”这一官方认定的术语产生不同的理解？而且，不同社会层次的汉族和彝族学生对这个术语的理解会不会也各不相同呢？因此在这里，我们首先考查彝族和汉族学生对待政府认定的民族成分的态度。因为对官方认定的民族身份的完全地、毫无疑问地认同应该不利于族群之间的关系。

### 三、 彝族和汉族学生对给定身份和自我身份的认同

#### 3.1 学生对少数民族“族群共同体”的主观认同<sup>1</sup>

少数民族身份的具体化和客观化（objectivation）是中国民族政策很重要的一部分。政策制定的初衷是为了实现民族之间事实上的平等。但是，与此同时，这种政策取向无论从认知论还是从方法论上都提出了新的挑战。法国汉学家杜瑞乐（J. Thoraval）就曾经明确提出，从属于某个族群远远不是一个自然的、客观的事实，而是在不同族群的接触过程中不断调整和明晰族际界限的过程：

“从理论上讲，无论是学者还是政策执行者的思索都旨在表明‘民族’这个根本性概念的不确定性和任意性（族群 *ethnie*、民族 *nationalité*、国族 *nation*），而中国的民族政策和社会生活的合法性正是建立在这样一个不确定的概念上。尽管这种批判式的讨论只是局部的而且还有一些自相矛盾的地方，但是旨在修正毛泽东时期一些极左的民族政策造成的偏激后果的新民族政策，在某些地区曾以一种始料未及的方式改变了官方认定的少数民族的分布状况。我们都知道在过去的十年之初（80 年代初），许多曾被识别为汉族的群体，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而将自己的民族成分改为少数民族。除此之外，还存在一些极具戏剧性的例子。比如生活在湖南和湖北的土家族人口在几年之内翻了四倍。虽然他们讲的语言属于藏缅语系，但是他们的汉化程度已经很深了。更确切地说，这些态度的转变更多地是为了享受政府在物质和文化上给予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因此我们可以说，这是在市场经济逐步确立的社会中的一些典型的、追逐现实利益的行为特征，而不是文化‘寻根’<sup>2</sup>。”

这正如我们在导论中提到的那样，族群身份的识别和少数民族优惠政策的结合常常会加强族群意识。就连对“原生论”（*primordialiste*）和“工具论”（*instrumentaliste*）持批判态度的斯蒂芬·郝

<sup>1</sup> 根据马克思·韦伯的表述。Max Weber, *Économie et Socié(2)*, éd Pocket, 1995, p. 130.

<sup>2</sup> Thoraval J., *Études chinoises*, vol. X, n° 1-2, printemps-automne 1991.



瑞也承认，在中国“一方面，国家不仅为其（族群认同）提供了产生的条件，而且通过颁布法令，使官方认可的民族成为了一个永久性的范畴；所以，另一方面，即便连工具主义的好处也阙如的话，只要符合国家的政策，某一民族的范畴就会持续下去<sup>1</sup>。”基于以上考虑，我们将通过对调查问卷的分析来考查我们的彝族和汉族学生对民族客观性的主观信仰。在中国，民族成分的“识别”和“制度化”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问学生“是否认为民族真实存在？”这个问题可能会像询问别人性别一样显得多此一举。因为每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身份证上都清清楚楚地标明了个人的族别。但这也恰恰是这个问题之所以有意思的地方。因为彝族和汉族学生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表二）正好能够明确地反映出他们对散播于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内化程度。

表二：你们认为民族真实存在吗？

民族	民族的存在性							
	不知道		存在		不存在		合计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汉族	7	2.4	230	79.0	<u>54</u>	<u>18.6</u>	291	100.0
彝族	7	4.0	155	87.6	<u>15</u>	<u>8.5</u>	177	100.0
总计	14	3.2	385	82.0	69	14.8	468	100.0

变量的相关性很明显。确定系数 $\chi^2 = 9.45$ ,自由度=2, 显著水平=99.11%.

表格中加深色有下划线的数字表示其实际数量远远高于（低于）理论数量。

表格中各列的总和是在 494 个样本中计算出来的。

在整个样本中，只有 3.2%（14 人）的学生对国家认定的少数民族划分置若罔闻。汉族学生（18.6%）对这种民族划分持怀疑态度的比例大于彝族学生（8.5%）。这样便有 79% 的汉族学生（230/291 人）和 87.6% 的彝族学生（155/177 人）认为民族的存在是一个客观事实。这个看来似乎不值一提的结论实际上很有意思，而且学生们给的理由也能充分表明他们对民族客观真实性的主观认定。我们在此引用个别学生的观点：“民族是真实存在的，因为他们就在我的身边”；“民族真实存在，因为国家给少数民族很多的优惠政策。如果民族不存在，那为什么少数民族能够享受这些权利？”“民族真实存在，因为少数民族有他们自己的文化、语言、历史、风俗习惯等等。这是事实。”所以，无论是从政策还是从文化的角度，学生们都认为“民族”是真实存在的。

表三：各学校学生对“你们认为民族真实存在吗？”的回答

学校	民族的存在性							
	不知道		存在		不存在		合计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1. 汉族城市高中汉族学生	1	0.7	107	79.9	26	19.4	134	100.0
2. 汉族城市高中彝族学生	1	11.1	7	77.9	1	11.1	9	100.0
3. 汉族农村高中汉族学生	4	4.7	70	81.4	12	14.0	86	100.0
4. 汉族农村高中彝族学生	0	0.0	14	82.4	3	17.6	17	100.0
5. 混合民族高中汉族学生	3	4.1	54	74.0	16	21.9	73	100.0
6. 混合民族高中彝族学生	2	3.8	44	84.6	6	11.5	52	100.0
7. 零混合民族高中彝族学生	4	4.0	89	89.9	6	6.1	99	100.0
总计	15	3.2	385	82.0	69	14.8	470	100.0

变量的相关性不是很明显。确定系数  $\chi^2 = 17.40$ ,自由度=12, 显著水平=86.50%.

注意：9 个格子(42.9%)的理论数量小于 5，确定系数的计算不具有操作性。

表格中各列的总和是在 494 个样本中计算出来的。

如果我们分别考查各个学校的学生对民族真实存在性的看法（表三），我们可以看到混合格

<sup>1</sup> 斯蒂文·郝瑞著（巴莫阿依、曲木铁西译），《田野中的族群关系与民族认同——中国西南彝族社区考察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第 27 页。



度较高的民族高中的汉族学生对民族真实性持怀疑态度的学生比例最高(21.9%);可是,零混合度民族高中的彝族学生对此持肯定态度的学生比例高达89.9%。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这4个学校彝族和汉族学生的回答并不具有很强的代表性(显著水平仅为86.5%),所以我们不能将调查样本得到的结果推及整个具备相关特征的彝族和汉族学生总体。但是无论怎样,就这个样本本身来看,我们仍然可以观察到校园不同的族群混合度对各民族学生的族群意识还是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我们还可以从家庭经济状况这个角度来进一步考查这四个学校的彝族和汉族学生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因为我们不能排除社会经济状况和族群属性这两个变量共同作用的可能性。鉴于我们的调查样本本身比较小,不能做更细的划分,在这里我们仅限于使用表一中的数据来诠释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

正如我们前面看到的那样,这四所学校中有两所招收学生的民族成分相对单一。可是,这两所学校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却截然相反:汉族城市高中招收的汉族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相对富裕;相反,零混合度民族高中招收的彝族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却很差。而且,与零混合度民族高中的彝族学生相比,汉族城市高中的汉族学生对民族真实性持否定态度的比例相对较高(19.4%)。由此我们认为,汉族学生在与出身于富裕家庭的彝族学生共同学习和接触的过程中,他们看待民族真实性这个问题的眼光会慢慢变得不那么绝对化。美国社会学家戈登在《美国人生活中的同化》(1964)这本书中提到的7个分析族群关系的变量中,就有一个是关于“意识中族群偏见的消除”(Absence of prejudice)<sup>1</sup>。所谓“意识中族群偏见的消除”是指:“一个族群在态度上、心理上对另一族群的接纳、不排斥。”<sup>2</sup>相反,对社会经济条件处于相对劣势族群的“偏见”(stigmatisation)往往会加深人们对这个族群的客观真实性的主观认定。

我们调查的汉族城市高中的学生里,彝族学生占极少数,只有9位。而且他们当中有6位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都比较好,几乎和他们的汉族同学没有什么差别。所以,“偏见”这种现象在这类彝族学生中相当少见。虽然这些彝族学生较高的汉化程度让我们有理由假设他们有较强的解构“族群”这个概念的意愿。但是在他们的回答中,认为民族真实存在的学生的比例仍然很高(77.8%)。我们可以把这个学校的汉族和彝族学生对民族真实性态度的不对称性(asymétrie)理解为彝族学生对官方给定的民族身份的习惯性接受。

零混合度高中的彝族学生几乎都出身于经济条件较差的家庭。这也使他们更倾向于认同民族的客观真实性。因为他们所处的社会和文化条件不利于他们形成对给定族群身份的批判态度。

同样的,汉族农村高中的学生也没有摆脱他们所处的社会经济条件的限制。彝族和汉族学生较低的族群混合度并没有促使他们形成对现有民族状况的批判态度。81.4%的汉族学生和82.4%的彝族学生都认为民族真实存在。

### 3.2 学生的民族成分和他们对“民族”一词的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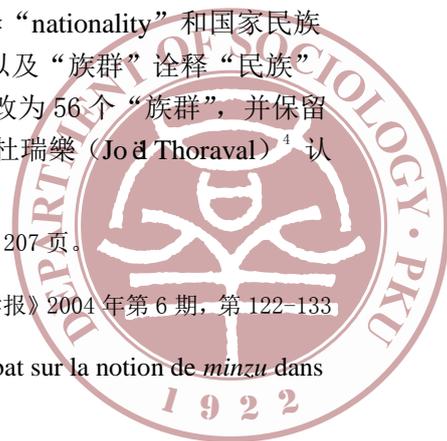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看到学生对“民族”客观性的主观认同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其不同的经济条件和族群混合度的影响。另外,我们也知道“民族”这一词由于其自身的多义性在国内外学者中都引起了许多争议。为了避免中国各“族群”的国际惯用翻译“nationality”和国家民族意义上的“nationality”在与国外学术交流过程中可能带来的误解,以及“族群”诠释“民族”这个词意义的准确性,中国民族社会学家马戎教授建议把56个民族改为56个“族群”,并保留他们的统称“中华民族”,以之与其它国家民族相区分<sup>3</sup>。法国汉学家杜瑞樂(Joël Thoraval)<sup>4</sup>认

<sup>1</sup> 马戎,《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第207页。

<sup>2</sup> 同上。

<sup>3</sup> 马戎,“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民族问题的‘去政治化’”,《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第122-133页。

<sup>4</sup> Thoraval J., «Le concept chinois de nation est-il "obscur"? À propos du débat sur la notion de minzu dans



为“民族”这个词实际上有两个意义。首先，它将中国与其它民族国家区分开来；其次，它也表明了居住在中国这片古老土地上的各个人群之间的不同之处，尤其是汉族与“非汉族”之间的不同之处。因此，使用少数民族这个词便能在某种程度上避免汉族与“非汉族”之间的混淆。

除了民族学者们对“民族”这个词所指代的族群、中华民族等意义的讨论，它的这种多义性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也随处可见。在日常用语中人们甚至直接用它来指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因此，在这里我们通过分析不同学生对“民族”这个多义词词义的排序（表四）来把握他们对这个词不同的理解。

表四：当你看到“民族”这个词的时候，想到了什么？

民族	对“民族”一词的理解									
	不知道		中华民族		少数民族		被歧视经历		合计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汉族	14	4.8	<u>182</u>	<u>62.5</u>	91	31.3	4	1.4	291	100.0
彝族	14	7.9	<u>80</u>	<u>45.2</u>	<u>76</u>	<u>42.9</u>	<u>7</u>	<u>4.0</u>	177	100.0
总计	28	6.1	262	55.9	167	35.2	11	2.8	468	100.0

变量的相关性很明显。确定系数  $\chi^2 = 15.00$ , 自由度=3, 显著水平=99.82%.

表格中加深色有下划线的数字表示其实际数量远远高于（低于）理论数量。

表格中各列的总和是在 494 个样本中计算出来的。

在整个样本中，接近 56% 的学生在看到“民族”这个词时首先想到的是中华民族。但是，在选择这个选项的学生中，汉族和彝族同学之间的差距相当明显。相关汉族学生的比例（62.5%）要比彝族学生的比例（45.2%）高出 17.3 个百分点。而后者在看到“民族”这个词时更多想到的是少数民族（42.9%），比持同样回答的汉族学生的比例高出 11.6 个百分点。由此，从“民族”这一词“族群”意义层面上来讲，占中国人口 91.51%<sup>1</sup> 的汉族很少将自己视作一个“族群”。相反，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却更多地从“族群”这个层面来定义自己的民族身份。我们知道中国的历史虽然不仅仅是汉族的历史，但是汉族毕竟在人口数量上占压倒性的大多数，而且他们在中华文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直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所以，汉族在很多情况下更多地将自己视作中华民族的一份子，而很少从“族群”的角度来考虑自己的民族身份。至于因族群身份而受歧视的经历<sup>2</sup>主要涉及的是彝族学生（4%）。在日常生活中，彝族学生因为家庭经济条件较差，常常被汉族用“野蛮”、“原始”这类词汇形容。我们前面看到的美国社会学家戈登提出的“意识中族群偏见的消除”这个变量恰好从反面印证了这一点。因此，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家庭经济条件差的彝族学生大多从“族群”角度来考虑自己的民族身份而不是从公民身份的角度来考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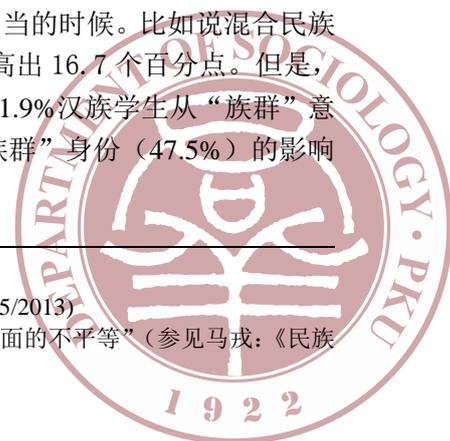
在综合考查了汉族和彝族学生的观点之后，我们还是从学校类型和学生经济条件这两个变量来进一步探讨这 4 所学校彝族和汉族学生观点的不同之处。

除了零混合度民族高中的学生以外，其它三个学校的大部分学生都从不同程度上将“民族”这一词理解为“中华民族”。而且，学校族群混合度越高，它们的汉族学生就越强调“中华民族”这个意义层面，尤其是当这个学校的汉族和彝族学生家庭经济状况相当的时候。比如说混合民族高中 72.6% 的汉族学生都强调自己“中华民族”的身份，比平均值高出 16.7 个百分点。但是，虽然从理论数据上占绝对少数，我们也不能忽视这个学校仍然还有 21.9% 汉族学生从“族群”意义层面定位自己的身份。相反，零混合度民族高中的彝族学生受“族群”身份（47.5%）的影响比其受公民身份的影响更深刻（37.4%）。

les années 1980 », *Bulletin de sinologie*, 65, 1990, pp. 24-41.

<sup>1</sup> 第六次人口普查 [http://www.stats.gov.cn/tjfx/jdfx/t20110428\\_402722253.htm](http://www.stats.gov.cn/tjfx/jdfx/t20110428_402722253.htm) (08/05/2013)

<sup>2</sup> 歧视在这儿指的是来自其它族群的偏见而不是指“对于不同族群在现实行为方面的不平等”（参见马戎：《民族社会学》，第 208 页）。



表五：各学校学生对“当你看到‘民族’这个词的时候，想到了什么？”的回答

学校	对“民族”一词的理解									
	不知道		中华民族		少数民族		被歧视经历		合计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1. 汉族城市高中汉族学生	5	3.7	77	57.5	51	38.1	1	0.7	134	100.0
2. 汉族城市高中彝族学生	5	11.1	5	55.6	3	33.3	0	0.0	13	100.0
3. 汉族农村高中汉族学生	6	7.0	53	61.6	24	27.9	3	3.5	86	100.0
4. 汉族农村高中彝族学生	0	0.0	11	64.7	5	29.4	1	5.9	17	100.0
5. 混合民族高中汉族学生	4	5.5	<u>53</u>	<u>72.6</u>	<u>16</u>	<u>21.9</u>	0	0.0	73	100.0
6. 混合民族高中彝族学生	4	7.7	27	51.9	21	40.4	0	0.0	52	100.0
7. 零混合民族高中彝族学生	9	9.1	<u>37</u>	<u>37.4</u>	<u>47</u>	<u>47.5</u>	<u>6</u>	<u>6.1</u>	99	100.0
总计	29	6.1	263	55.9	167	35.2	11	2.8	470	100.0

变量的相关性很明显。确定系数  $\chi^2 = 36.87$ ，自由度=18，显著水平=99.46%。

表格中加深色有下划线的数字表示其实际数量远远高于（低于）理论数量。

注意，12个格子(42.9%)的理论数量小于5，确定系数的计算不具有操作性。

表格中各列的总和是在494个样本中计算出来的。

至于因民族身份而受歧视的经历（偏见）主要涉及到的是零混合度民族高中的彝族学生。因为在我们调查的样本中，这些彝族学生并没有和汉族学生共同学习的环境，所以，他们谈到的受歧视经历应该发生在校外的日常生活中。这也从侧面体现了学校在消除族群成见上起到的重要作用。如果学校能够创造一个各族群学生共同学习的环境，这对消除族群成见应该能够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比如汉族城市高中和混合民族高中的彝族学生就没有这样的经历。但是，“偏见”和社会经济条件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虽然汉族农村高中的彝族学生只有一位同学提到自己的这种经历，但毕竟这种现象并没有发生在经济条件较好的彝族学生身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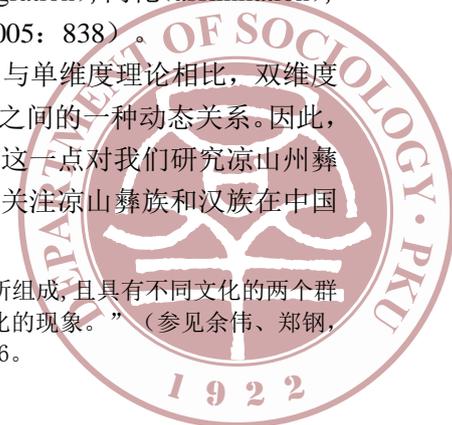
#### 四、汉族和彝族学生的民族关系与“文化适应”<sup>1</sup>

在前面的两个部分，我们从宏观的层面考察了国家民族政策对各民族族群意识的影响。在这一部分，我们将把重点转移到各个族群成员身上，来了解他们是怎样对待族群多样性的，在他们的生活中存不存在某种程度上的“文化适应”。

20世纪70年代以前对“文化适应”的研究多是单维度的，“这一理论认为文化适应中的个体总是位于从完全的原有文化（culture of origin/heritage culture）到完全的主流文化这样一个连续链上的某一点，并且这些个体最终将到达完全的主流文化这一点，也就是说对于新到一个文化环境的个体来说，其文化适应的最后结果必然是被主流文化所同化”（余伟、郑钢，2005：837）。美国社会学家戈登曾在这个理论上发展了美国社会的“熔炉”理论（melting-pot）。这个单维度理论后来逐渐被双维度模型所挑战。John Berry根据文化适应中的个体对自己原来所在群体和现在与之相处的新群体的态度区分出了4种文化适应策略：“整合（integration），同化（assimilation），分离（separation），和边缘化（marginalization）”（余伟、郑钢，2005：838）。

对这两个关于“文化适应”理论模型的比较十分有意义。因为，与单维度理论相比，双维度模型显得更加全面，也更能诠释多元文化社会里各个相互接触的文化之间的一种动态关系。因此，也避免了认为所有相互接触的文化都将会被主流文化所同化的宿命。这一点对我们研究凉山州彝族和汉族的族群关系是相当具有启发意义的。在此理论上，我们关注凉山彝族和汉族在中国

<sup>1</sup> 1936年，Redfield, Linton 和 Herskovits 曾这样定义“文化适应”：“由个体所组成，且具有不同文化的两个群体之间，发生持续的、直接的文化接触，导致一方或双方原有文化模式发生变化的现象。”（参见余伟、郑钢，“跨文化心理学中的文化适应研究”，《心理学进展》，2005，13（6）：836-846。



现代化进程中的族群关系发展过程。

美国社会学家戈登在 1964 年所提出的衡量族群关系的 7 个变量体系在研究族群关系中十分具有可操作性。马戎教授认为在考察戈登提出的第二个变量“社会结构的同化即实质性的社会结构的相互渗入”时，可以在实地调查中以“朋友往来”这个具体的内容来加以测度（马戎，2004：223）。

因此，为了了解凉山彝族和汉族学生的交往状况，我们在调查问卷中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你的朋友中，大部分是什么人？”接下来，我们将具体分析彝族和汉族学生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 4.1 不同民族同学之间的友谊

在表六中，我们可以看到相比彝族学生来说，汉族选择不同族群的个体做朋友的学生比例比较小，只占 6.2%。彝族学生不同族群朋友的比例占 18.1%，比汉族学生的要多一些。但是从总体来看，无论是汉族学生还是彝族学生，他们都更愿意和本族群的个体交朋友。

表六：择友情况

民族	朋友构成					
	本民族		其他民族		合计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汉族	271	93.1	<b>18</b>	<b>6.2</b>	289	100.0
彝族	140	79.1	<b>32</b>	<b>18.1</b>	172	100.0
总计	411	84.4	50	14.0	461	100.0

变量的相关性很明显。确定系数  $\chi^2 = 17.08$ , 自由度=1, 显著水平=99.99%.

表格中加深色有下划线的数字表示其实际数量远远高于（低于）理论数量。

表格中各列的总和是在 494 个样本中计算出来的。

同样地，我们还是从各个学校学生的回答来做进一步补充。

表七：各学校彝族和汉族学生的择友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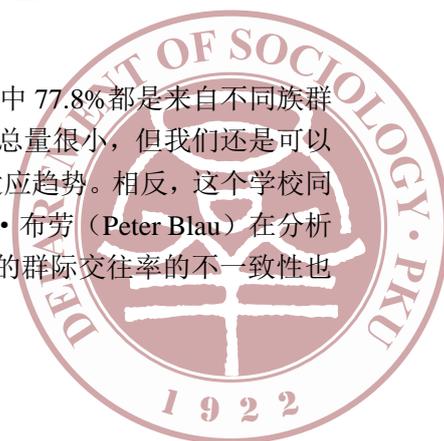
学校	朋友构成					
	本民族		其他民族		合计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1. 汉族城市高中汉族学生	129	96.3	5	3.7	134	100.0
2. 汉族城市高中彝族学生	2	22.2	<b>7</b>	<b>77.8</b>	9	100.0
3. 汉族农村高中汉族学生	84	97.7	2	2.3	86	100.0
4. 汉族农村高中彝族学生	15	88.2	2	11.8	17	100.0
5. 混合民族高中汉族学生	59	80.8	12	16.4	71	100.0
6. 混合民族高中彝族学生	30	57.7	<b>18</b>	<b>34.6</b>	48	100.0
7. 零混合民族高中彝族学生	93	93.0	5	5.1	98	100.0
总计	412	84.4	51	14.0	463	100.0

变量的相关性很明显。确定系数  $\chi^2 = 95.17$ , 自由度=6, 显著水平=99.99%.

表格中加深色有下划线的数字表示其实际数量远远高于（低于）理论数量。

表格中各列的总和是在 494 个样本中计算出来的。

我们首先注意到的是汉族城市高中的彝族学生。他们的朋友圈子中 77.8% 都是来自不同族群的个体。而他们本族群的朋友只占 22.2%。虽然这个学校的彝族学生总量很小，但我们还是可以观察到这个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的彝族群体对主体文化有很强的文化适应趋势。相反，这个学校同等经济条件下的汉族同学却很少结交不同族群的个体（3.7%）。彼得·布劳（Peter Blau）在分析族际交往时曾指出：“两个群体规模上的差异越大，那么它们在彼此的群际交往率的不一致性也



就越大”（布劳，1991：35）<sup>1</sup>。因此，我们调查中的这种现象可以解释为在凉山州社会经济条件较好的群体中，汉族的比例占绝对的大多数。所以，由于人口比例上的差异，这个社会层次的汉族和彝族之间的友谊并不具有对称性。

然而，在混合民族高中里，汉族和彝族学生无论从经济条件还是人口数量上都几乎相当，可是汉族学生选择不同族群个体做朋友的比例仍然十分的小，只有 16.4%。而这个学校的彝族同学选择不同族群个体做朋友的比例占 34.6%。就读于汉族农村高中的汉族学生选择不同族群个体做朋友的比例就更小了（2.3%）。我们在表一中看到，汉族农村高中的族群混合度比汉族城市高中的还要高一些，但是他们学生的家庭经济条件要差很多。这也许可以说明影响各族群同学交往的因素不仅仅是族群混合度和族群的人口比例，社会经济地位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甚至是起决定性的因素。而且族群性和社会经济地位这两者之间往往呈现出重叠的现象，且相互作用。这个结论也证实了零混合度民族高中的彝族学生的交友状况。

#### 4.2 对不同民族文化的了解

研究不同族群个体之间的友谊只是了解文化适应过程的第一步。为了进一步加深了解，我们也关心不同族群成员对异文化的关注程度。

表八：文化适应的意愿（了解其他民族的传统文化）

民族	是否愿意了解其他民族的传统文化							
	愿意		不愿意		无所谓		合计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汉族	214	73.5	9	3.1	<u>66</u>	<u>22.7</u>	289	100.0
彝族	156	88.1	2	1.1	<u>16</u>	<u>9.0</u>	174	100.0
总计	370	78.3	11	2.6	82	8.0	463	100.0

变量的相关性很明显。确定系数  $\chi^2 = 16.49$ , 自由度=2, 显著水平=99.97%。

表格中加深色及有下划线的数字表示其实际数量远远高于（低于）理论数量。

表格中各列的总和是在 494 个样本中计算出来的。

从总体上来讲，当我们提出“你想不想了解其它民族的传统文化？”这个问题的时候，无论是彝族还是汉族学生都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只有 3.1%的汉族学生和 1.1%的彝族学生的回答是否定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我们调查样本中的学生文化适应的意愿很强，尤其是彝族学生。尽管这个结果可能表达了学生们真实的想法，但是这个调查问卷是利用学生上课时间做的，而且当时我们也在场。这样的调查环境可能会对学生的回答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一定的导向作用。也许在学校课堂这个场所，学生会主动去迎合调查者的心态。但是无论怎样，我们还是可以看出相当一部分的汉族学生（22.7%）在回答这个问题时表现出一种漠视的态度，而且这个比例远远超出了理论数值。然而，在彝族学生当中只有 9%的学生持这种漠视的态度，这个比例远远低于理论数值。

在对关于族际友谊问题的分析中，我们看到汉族学生虽然不完全排斥与不同族群的个体建立友谊关系，但是他们异族朋友的比例却很小。这个结论在这儿得到进一步的证实。那么怎样看待汉族学生的这种漠视的态度呢？在这儿，我们节选对西昌市一位城镇居民关于族群关系的访谈，她的表述也许能够从侧面解释汉族学生的这种漠视态度：

采访一：

汉族，女，53 岁，城镇户口，她的父亲以前是城里一所中学的工人，母亲是家庭妇女。她们有五姐妹，从小在城里长大。

（提问）你小的时候，城里面有没有彝族？

（回答）当然有了，遍街都是。一到晚上就在街边睡。白天卖土豆、柴火、鸡这些东西。那

<sup>1</sup> 马戎，《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第 476 页。



时候我在上小学，晚上有时候还害怕，不敢出来玩。心头就觉得那些彝族害怕的很。大人也吓我们说“不要出去哦，出去老背背来了。蛮子来了，背起走了，看你怎么找得到回来。”

(提问)那你们以前和彝族有没有接触呢?

(回答)哪儿有呢，没得。你要给他们买东西你就买，买了他给你送到家里来，你把钱给了，他就走。我们从来不惹他们，他们也不惹我们。

同样的话语在对农村汉族的采访中也能听到：“孩子小时候，为了不让他们乱跑。我们都常说蛮子来了把你背上山，就再也回不来了。”凉山汉族人民对彝族人民的这种“成见”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人类学家林耀华曾经在 1948 年出版的《凉山夷家》第八章中提到汉人被夷人虏为娃子的这种现象<sup>1</sup>：

“汉娃的来源都是夷人从汉地边区掳掠而来。掳掠之法有时半路埋伏，劫捆行人，有时夜班结队攻击汉村，有时冤家决斗俘虏对方，甚至汉人或因贸易买卖，或因开垦种植向夷家投保，中途夷人反保掳为奴娃者，亦所在多有。”

时至今日，凉山州解放已经半个多世纪了。但是，这种历史记忆依然影响着这个地方族群之间的关系。而且，如“解放前，凉山州的彝族还处在奴隶社会。”；“彝族又野蛮又暴力”，等等，这些陈词滥调在这个地方依旧耳熟能详。凉山州是一个文化多元的地区，汉族和彝族这两个人口比例相当的族群在这儿共同生活。这种持久的族群“偏见”对族群关系的负面影响不可忽视。虽然学校的教育以及国家对民族团结政策的宣传，使这种成见在校园环境中逐渐淡化。但是在日常生活中的所见所闻所感，使这种成见依然寄存在汉族同学意识当中。

接下来，我们分析不同学校学生对文化适应的态度。

表九：各学校学生文化适应的意愿(了解其它民族的传统文)

学校	是否愿意了解其他民族的传统文							
	愿意		不愿意		无所谓		合计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1. 汉族城市高中汉族学生	106	79.1	3	2.2	25	18.7	134	100.0
2. 汉族城市高中彝族学生	9	100.0	0	0.0	0	0.0	9	100.0
3. 汉族农村高中汉族学生	63	73.3	4	4.7	19	22.1	86	100.0
4. 汉族农村高中彝族学生	15	88.2	0	0.0	2	11.8	17	100.0
5. 混合民族高中汉族学生	47	64.4	2	2.7	<u>22</u>	<u>30.1</u>	71	100.0
6. 混合民族高中彝族学生	39	75.0	2	3.8	8	15.4	49	100.0
7. 零混合民族高中彝族学生	<u>93</u>	<u>93.9</u>	0	0.0	<u>6</u>	<u>6.1</u>	99	100.0
总计	372	78.3	11	2.6	82	8.0	465	100.0

变量的相关性很明显。确定系数  $\chi^2 = 28.44$ , 自由度=12, 显著水平=99.52%。

表格中加深色及有下划线的数字表示其实际数量远远高于(低于)理论数量。

注意，9个格子(42.9%)的理论数量小于5，确定系数的计算不具有操作性。

表格中各列的总和是在494个样本中计算出来的。

虽然零混合度民族高中的彝族学生在学校所能接触到的汉族学生很少，而且在我们的样本中其汉族学生人数为零，但他们所表达的了解其它族群文化的意愿却最为强烈。应当注意到的是，这个学校的彝族学生绝大多数都是出身于经济条件较差的家庭(参见表一)。

同时，汉族城市高中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的彝族学生也一致表达了他们文化适应的意愿。但是，他们的汉族同学中只有 79.1% 表达了同样的观点。这种漠视的态度在农村汉族高中和混合民族高中的汉族学生中更加明显。汉族同学这种对不同文化的漠视态度与其家庭经济条件呈负相关。也就是说，家庭经济条件越差的汉族学生越不愿意去了解不同族群的文化。同时，族群混合度在其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高族群混合经历的汉族学生并不会因此而更愿意去了解不同族群的文



化。在我们的调查样本中，混合民族高中的汉族学生对少数民族文化适应持否定态度的比例高达30.1%，是四所中学里最高的。综上所述，彝族学生无论家庭经济状况如何，是否经历族群混合，都对中华文化有着强烈的文化适应意愿。相反，家庭经济状况较差的汉族学生对少数民族的文化适应更多持的是一种漠视的态度，而且这种态度还会因为有族群混合度的经历而加深。

### 4.3 族群性与跨民族婚姻的态度

马戎教授认为“族际通婚通常并不被本族群认为仅仅是通婚者个人的私事，在许多场景下，这种族群认同观念和相应的凝聚力会使本族的父母、亲属、家族、社区对于子女、族人的跨族群通婚表示他们或者赞同或者反对的意见。两族成员之间的通婚愿望，是得到本族人群体的支持还是反对，在某种意义上被视作体现两族关系总体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马戎，2004：436-437）。因此，在考察了凉山州彝族和汉族的学生的族际友谊和对异文化的态度以后，我们将视角聚焦在这两个族群学生对待跨民族婚姻的态度上。

#### 4.3.1 凉山彝族传统的婚姻观

1956年凉山民主改革之前，凉山州的彝族实行严格的同族内婚、等级内婚和家支外婚的婚姻习惯法<sup>2</sup>。任何违反婚姻习惯法的个人“均要受到开除其族籍或烧死的严厉惩罚：对于婚姻关系的确立、认可和维系均受制于严格的习惯法和家支制度，当事人无任何权利”（马林英）。根据20世纪50年代政府组织的大规模社会历史调查报告所修订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调查资料丛刊》，马戎教授整理了各民族族际通婚的情况表（马戎，2004：447）：

表十： 50年代社会调查报告中反映的族际通婚状况

族际通婚状况		民族（共计44个）
很少与外族通婚		珞巴、佉、彝、苗、黎、鄂伦春（6）
在一定程度上与外族通婚	无特殊选择	藏、土、柯尔克孜、仫佬（4）
	有族属选择	傣、哈尼、白、拉祜、德昂、布依、阿昌、布朗、独龙、傈僳、景颇、普米、壮、仫佬、侗、水、门巴（17）
	有宗教选择	维吾尔、回、哈萨克、塔吉克、撒拉、东乡、保安（7）
	有性别选择	瑶、布依、赫哲（3）
与外族通婚较多		满、纳西、怒、京、畲、达斡尔、蒙古（7）

通过这个表我们可以看出在20世纪50年代，彝族还是一个“很少与外族通婚”的族群。尽管不同的学者对族际通婚的分类和通婚状况的判断还各执一词，但是陈明侠教授仍然肯定了上面这个有关彝族通婚的结论。彝族学者马林英通过实地调查发现，在从凉山民主改革到改革开放这20年的时间里，凉山州城市彝族的婚姻观念已经有所松动，出现了部分跨民族婚姻的现象。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这种现象在80年代以后产生了一定的规模。而且，所涉及到的人群不再仅仅是凉山的城镇彝族，还包括农村彝族；并且不仅是“同族内婚、等级内婚和家支外婚”的习惯法受到挑战，甚至还出现了涉外婚姻。

斯蒂文·郝瑞在实地调查中发现：“诺苏社会的核心是cytvie（此维）即父系家支。当两位素不相识的诺苏人相遇时，他们首先询问的是对方的家支[……]”<sup>3</sup>（郝瑞，2000：95）。“家支之间的联姻常常形成当地强大的家支联盟，一代又一代的姑舅表使得当地的人们亲上加亲，亲属网络变得错综交织。因此，即使今天家支头人对婚姻的缔结还十分重视（郝瑞，2000：97）。”而且，“今天，不同等级之间不能通婚的禁制依然还非常严格地持守着。[……]在诺伙与曲伙混居的地

<sup>1</sup> 林耀华，《凉山夷家》，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五月，第78页。

<sup>2</sup> 马林英，“对凉山彝族婚姻文化的变迁考察”，彝族人网：<http://www.yizuren.com/plus/view.php?aid=8989>（17/05/2013）

<sup>3</sup> 斯蒂文·郝瑞著，（巴莫阿依、曲木铁西译），《田野中的族群关系与民族认同——中国西南彝族社区考察研究》，

区，诺伙和曲伙自由地交往，在对方家里做客，常常成为好朋友。但相互之间不会破坏等级内婚的禁制，只有在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诺苏才会考虑打破这一禁制，可随之而来的常常是指责与反对。大多数诺伙情愿把他们的女儿嫁给汉族也不愿意嫁给曲伙。（郝瑞，2000：99）”

其实，两位学者的调查结果并不矛盾。凉山州彝族的传统婚姻观在中国社会经济的大环境下确实发生了变迁。因此，便产生了“传统”与“现代”婚姻观念的博弈。那么，量化这种博弈的程度便显得尤为重要而且也需要长时间的跟进。在此，我们从高中汉族和彝族学生这个群体去考察这种博弈程度。关于跨民族婚姻的问题，我们假设汉族和彝族学生在涉及到其个人与否的情况下，态度会有所不同。因此在这里，我们首先询问他们从理论上对跨民族婚姻的态度（表十一和表十二），然后再询问他们自己是否愿意接受跨民族婚姻（表十三和表十四）。

#### 4.3.2 族群性和对跨民族婚姻的态度（理论上）

我们首先考查彝族和汉族学生从理论上对跨民族婚姻的态度。马戎教授认为在一般情况下，当两个族群的通婚率达到 10% 以上就可以说明他们之间的族群关系比较融洽。应该注意的是，我们调查的对象是义务教育阶段后经过第一次筛选的学生群体，其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所以得到的结果只能代表这个受教育层次及其以上的彝族和汉族群体。

表十一：理论上对跨民族婚姻的态度

民族	对待跨民族通婚的态度							
	好事		坏事		无所谓		合计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汉族	132	45.4	<u>7</u>	<u>2.4</u>	149	51.2	288	100.0
彝族	102	57.6	<u>17</u>	<u>9.6</u>	<u>53</u>	<u>29.9</u>	172	100.0
总计	237	49.8	24	5.1	202	43.5	460	100.0

变量的相关性很明显。确定系数  $\chi^2=26.04$ , 自由度=2, 显著水平=99.99%。

表格中加深色及有下划线的数字表示其实际数量远远高于（低于）理论数量。

表格中各列的总和是在 494 个样本中计算出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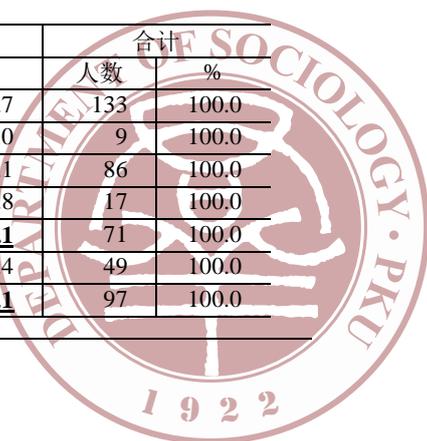
从理论上讲，45.4% 的汉族学生和 57.6% 的彝族学生认为跨民族婚姻是一件好事情。同时，我们也看到汉族对此持“无所谓”态度的学生比例远远高于彝族学生（51.2% 比 29.9%）。彝族学生对跨民族婚姻的肯定态度可以解释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与汉族的生活方式正在逐渐趋同化。马林英也认为“彝族传统的和封闭的婚姻文化环境近年来随着国家政治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而迅速开放，出现了与主流文化趋同的倾向。”可是，认为这是一件不好的事情的彝族学生比例仍然很重 9.6%，高出持同样观点的汉族学生比例 7.2 个百分点。在前面一部分，我们看到彝族对不同族群文化感兴趣的学生多于汉族。然而对于跨民族婚姻，他们却显得相对沉默。

接下来，我们分析不同学校彝族学生内部的经济差异及其不同的族群混合度会不会对他们有关跨民族婚姻的态度产生影响（表十二）。

表十二：各学校学生对跨民族婚姻的看法（理论上）

学校	对待跨民族通婚的态度							
	好事		坏事		无所谓		合计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1. 汉族城市高中汉族学生	66	49.3	<u>1</u>	<u>0.7</u>	66	18.7	133	100.0
2. 汉族城市高中彝族学生	4	44.4	0	0.0	5	0.0	9	100.0
3. 汉族农村高中汉族学生	45	52.3	5	5.8	36	22.1	86	100.0
4. 汉族农村高中彝族学生	11	64.7	0	0.0	6	11.8	17	100.0
5. 混合民族高中汉族学生	23	31.5	1	1.4	<u>47</u>	<u>30.1</u>	71	100.0
6. 混合民族高中彝族学生	23	44.2	6	11.5	20	15.4	49	100.0
7. 零混合民族高中彝族学生	64	64.4	<u>11</u>	<u>11.1</u>	<u>22</u>	<u>6.1</u>	97	100.0

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



总计	236	49.8	24	5.1	202	8.0	462	100.0
----	-----	------	----	-----	-----	-----	-----	-------

变量的相关性很明显。确定系数  $\chi^2=49.99$ , 自由度=12, 显著水平=99.99%。

表格中加深色及有下划线的数字表示其实际数量远远高于（低于）理论数量。

注意, 7个格子(33.3%)的理论数量小于5, 确定系数的计算不具有操作性。

表格中各列的总和是在494个样本中计算出来的。

汉族城市高中的彝族学生对跨民族婚姻持“肯定”态度的比例相对于持“无所谓”态度的要低一些。然而, 在其它3所中学的彝族同学中, 这个比例正好相反。也就是说, 这3所中学的彝族学生更倾向于认为跨民族婚姻是一件好事情。我们知道汉族城市高中彝族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比其它另外3所高中的都要好。因此, 我们可以理解为家庭经济条件较差的彝族学生更希望接受跨民族婚姻, 因为他们认为这样的婚姻在某种程度上能改变他们的生活状况。而且, 家庭经济状况越差的彝族学生对跨民族婚姻的认同程度越高。我们知道汉族农村高中的彝族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是这四所中学里最差的, 64.7% (11/15 学生) 的学生的家庭处于贫困状态, 正好同样比例的彝族学生认为跨民族婚姻是一件好事情。零混合度民族高中的彝族学生也是同样的情况: 60%的彝族学生的家庭处于贫困状态, 64.6%认同跨民族婚姻。

从族群混合度来看, 虽然零混合度民族高中的大部分学生对跨民族婚姻持“肯定”态度。但是与理论人口相比, 这个学校对此持“否定”态度的学生比例也是相当高的(11.1%)。另外, 在混合度最高的民族高中, 彝族学生持“否定”态度的比例也很高11.5%。而且, 他们的汉族学生对此表达“无所谓”态度的比例高达64.4%。因此, 我们可以推断出, 还有相当一部分没有族群混合经历的、家庭经济状况较差的彝族学生对跨民族婚姻持“否定”态度。然而, 对于跨民族婚姻这个变量, 高族群混合度这个因素对家庭经济条件较差的汉族和彝族学生也不一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李晓霞研究员在调查南疆农村维汉通婚的时候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维汉通婚相对在单民族聚居村落较易出现, 维汉混居村落却相对较少。”当然, 在这个相似的结论背后所隐藏的原因是不同的。维吾尔族和汉族之间的族群关系受宗教因素和当前社会大背景下紧张的族群关系影响很大。凉山州彝族和汉族的关系更多是“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博弈。

汉族和彝族学生对跨民族婚姻理论上的态度并不能全面反映他们是否真正愿意接受。因此, 在这一节我们将继续讨论他们对以下问题的回答: “你愿不愿意与不同民族的人结婚?”

#### 4.3.3 族群性与个人对跨民族婚姻接受

“你愿不愿意与不同民族的人结婚?” 这个问题不再是对跨民族婚姻这个问题的泛泛而谈, 而是涉及到了被询问者自身的主观意愿。

表十三: 你愿不愿意和不同民族的人结婚?

民族	你是否愿意和其他民族的成员结婚							
	愿意		不愿意		不知道		合计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汉族	139	47.8	33	11.3	<b>114</b>	<b>39.2</b>	286	100.0
彝族	101	57.1	32	18.1	<b>40</b>	<b>22.6</b>	173	100.0
总计	240	52.2	65	13.4	154	32.6	459	100.0

变量的相关性很明显。确定系数  $\chi^2=14.66$ , 自由度=2, 显著水平=99.93%。

表格中加深色及有下划线的数字表示其实际数量远远高于（低于）理论数量。

表格中各列的总和是在494个样本中计算出来的。

从总体上来看, 接受跨民族婚姻的学生比例比上一节谈理论态度时的有所增加, 从表十一的49.8%增加到这儿的52.2%。可是, 不接受跨民族婚姻的学生比例增加幅度却很大, 从表十一的5.1%增加到这儿的13.4%。这些比例的变化主要是由于前面理论上持“无所谓”态度的学生开始做出明确的个人选择。而且, 汉族学生态度的变化是最明显的。拒绝跨民族婚姻的汉族学生比例从

前面的 2.4%增加到了现在的 11.3% (+8.9 个百分点)。在彝族学生中, 这种态度的变化要相对弱一些, 从 9.6%增加到了 18.1% (+8.5 个百分点)。与之相关, 前面态度模棱两可的学生比例下降了, 且汉族学生下降的比例远远高于彝族学生。

和前面一样, 在表十四中, 我们进一步考查不同学校学生的态度。

表十四: 各学校学生对“你愿不愿意与不同民族的人结婚?” 的回答

学校	你是否愿意和其他民族的成员结婚							
	愿意		不愿意		不知道		合计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1. 汉族城市高中汉族学生	82	61.2	10	7.5	41	30.6	133	100.0
2. 汉族城市高中彝族学生	7	77.8	0	0.0	2	22.2	9	100.0
3. 汉族农村高中汉族学生	41	47.7	14	16.3	29	33.7	84	100.0
4. 汉族农村高中彝族学生	<b>15</b>	<b>88.2</b>	0	0.0	2	11.8	17	100.0
5. 混合民族高中汉族学生	<b>18</b>	<b>24.7</b>	9	12.3	<b>44</b>	<b>60.3</b>	71	100.0
6. 混合民族高中彝族学生	27	51.9	9	17.3	12	23.1	48	100.0
7. 零混合民族高中彝族学生	52	52.5	<b>23</b>	<b>23.2</b>	<b>24</b>	<b>24.2</b>	99	100.0
总计	242	52.2	65	13.4	154	32.6	461	100.0

变量的相关性很明显。确定系数  $\chi^2 = 56.37$ , 自由度=12, 显著水平=99.99%。

表格中加深色及有下划线的数字表示其实际数量远远高于(低于)理论数量。

表格中各列的总和是在 494 个样本中计算出来的。

在汉族城市高中里, 理论上回答“无所谓”的汉族学生数量减少了 25 个。其中 9 个在此选择了“不愿意”, 而另外 16 个选择了“愿意”。同样地, 理论上选择“无所谓”的彝族学生当中也有 3 个在此选择了“愿意”。我们认为, 虽然这个学校的彝族学生数量很少, 但他们和大部分汉族学生一样, 都出身于条件比较好的家庭。因此, 他们之间能够感知到的差距就没有那么明显了, 这也应该是他们接受跨民族婚姻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个问题在其它三所学校显得更为复杂。首先汉族农村高中和混合民族高中的汉族学生回答“愿意”的比例都比前面泛泛而谈时的低。在汉族农村高中, 这个比例从理论上的 52.3%降到了现在的 47.7%; 在混合民族高中, 从理论上的 31.5%降到了现在的 24.7%。而且, 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实际上, 尤其是从实际上, 愿意接受跨民族婚姻的汉族学生比例都要比彝族的低很多。比如在这两所学校, 愿意接受跨民族婚姻的彝族学生比例是汉族的两倍。而且他们汉族学生的家庭条件整体上要比汉族城市高中的差, 但是和同学校的彝族相比又要高一些。所以经济条件这个因素在决定他们是否接受跨民族婚姻时应该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同时, 与经济条件相伴的还有前面所提到的对彝族的“成见”。这两个因素对族群关系的影响都是相当不利的。

至于彝族学生, 我们可以归纳出三种不同的情况: 低族群混合度汉族农村高中的彝族学生对跨民族婚姻表现出很高的认同(88.2%)。他们有强烈的希望通过跨民族婚姻改变自身生活状态的期望。

混合民族高中愿意接受跨民族婚姻的彝族学生比例虽然比同学校汉族的高, 但是与其他彝族相比仍然非常低, 只占 51.9%。这再次证明了前面提到的结论: 高族群混合度不一定有利于经济条件较差的族群之间的融合。

零混合度民族高中的学生在此选择“同意”的比例也下降了, 从理论上的 64.6%下降到 52.5%, 12 个学生改变了自己的选择。这些彝族学生在理论和实际上态度的转变反映了他们一方面有着强烈的文化适应愿望; 但另外一方面, 那种自然而然的传统观念又在无形中牵绊着他们。

这些现象我们在访谈中也同样遇到:

**采访一:**

彝族, 女, 30 岁, 城市户口(出身农村)。她有 8 个兄弟姐妹, 但他们家只有她读到研究生。



她本科学习汉语言文学，研究生学教育管理。现在在凉山日报社工作。她的丈夫来自中国北方，他们有一个两岁的儿子。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只教儿子普通话，并且不打算教儿子彝语和方言。

（问题）彝族现在可以和汉族结婚吗？

（回答）可以，我丈夫就是汉族，我们在大学的时候认识的。其实现在彝族结婚已经不受限制了。我的两个妹妹都只读了小学，她们有一个和汉族结婚了，另外一个和彝族结婚了。

采访二：

彝族，女，23岁，农村户口。她为了帮母亲照顾弟弟妹妹，11岁就没有继续念小学了。她的父亲在城里打工，她现在也在城里做些零工。但是她不大能够听懂汉语。

（提问）你选男朋友的时候，想选个汉族还是彝族？

（回答）（很害羞）最好是个彝族，但是汉族我觉得也可以。如果是汉族的话，我的父母和爷爷奶奶都不会同意的。

采访三：

彝族，女，20岁。她正在四川某大学上大二，学的是新闻专业。她很喜欢彝族文化，而且可以看得出来她为彝族文化而感到骄傲。当我们在谈到凉山州举办的彝族火把节时，她说：“你看了今年组织的彝族火把节没有？简直是乱七八糟。肯定是那些完全不懂彝族文化的汉族组织的。要是我晓得是哪个，我肯定揍他。我们的彝族文化里面有那么多好东西，你看过毕摩做仪式没有？简直太完美了。我打算做一个相关的纪录片。”

（提问）你接不接受和汉族结婚？

（回答）民族成分对我来说不重要，它不是我选择另一半的标准。最重要的爱情和对方的能力。如果我们相爱的话就在一起，汉族和彝族都不重要。其实，我还更想和汉族结婚。因为汉族男人懂得疼爱他们的老婆。不像彝族一样，喝多了就打老婆。

凉山彝族地区开放半个多世纪以来，那些尚未经历族群和社会混合的、相对贫困的彝族人民还生活在一种相对封闭的状态，远离文化适应。然而，他们当中很大一部分希望能够摆脱这样的现状，尤其是在经济高度全球化的今天，全世界人民的生活方式都在经历着空前的变化。这三个采访的节选进一步确认了彝族和汉族在现代化潮流下经历着的文化适应过程。在学校这个机构中，社会出身和族群混合度这两个变量相互作用着。这也证明了学校教育在推动个体社会流动性上起着重大作用，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它是怎样改变个人的思想和世界观的。

另外，在这四所学校外进行的访谈也证实了凉山州的族群关系状况与1985年马戎教授在内蒙古赤峰地区的农村和牧区研究部分结果的相似性（马戎，2004：206）。首先，从教育层面上来讲，“跨民族婚姻的比例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增长”（如采访一）。其次，从年龄的角度来看，“年龄越大，族际通婚率越低，族内结婚率越高。”我们看到80年代以前人们受传统思想的影响更深（如采访二）。另外，我们可以对本族群文化有着深刻的感情，但是这对与不同文化的个体建立爱情关系并不造成阻碍（如采访三）。这同时也印证了巴斯蒂德（Roger Bastide）的文化切分理论（principe de coupure<sup>1</sup>）和马戎教授提出的群体意识的多层次性（马戎，2004：72）。

## 结 论

<sup>1</sup> Denys Cuche, 1994, "Le concept de "principe de coupure" et son évolution dans la pensée de R. Bastide" in P. Laburthe-Toïra (sous la dir. de). Le r éjouissement de l'ab îme, Paris. L'Harmattan. 1994. p. 77.

“文化切分(principe de coupure)能够使个体能安然无恙地、同时在不同的文化中生存。在不同的文化中，个体并没有被“分成两半”而是他将社会现实分成相互独立的小板块。在不同的文化小板块中需要不同的参与方式，也正是这种相互独立性，个体才并不会认为这些不同文化板块之间是相互矛盾的。这种个体可以控制的切分使他能够在不同文化之间游刃有余而不会导致其自身精神分裂。”



中国的族群问题有着它的特殊性。我们看到从政策上对“族群”客观化（essentialisation）和工具化（instrumentalisation）最终加深了少数民族的族群认同。而且，家庭经济状况各异的彝族和汉族学生会因为他们接触的不同族群混合度的校园环境而对“民族”这个词有着不同的理解和态度。学校机构的这种招生组织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中和了“民族”这个身份标签在现实生活中的客观实在性，并给官方识别认定的民族身份带来了一定的流动性。可是，从族群成员个体来看，从社会经济条件和族群混合度来分析有关族群关系的多个变量，让我们观察到虽然汉族和彝族学生对待“文化适应”的态度与族群混合度有关，但在更大程度上是取决于他们的社会经济条件的。沃勒斯坦（Wallerstein）认为族群的“真实存在性”掩饰了各个社会阶级的利益冲突，他假设（但他承认这个假设还没有得到证实）民族属性（像宗教、种族和种姓一样）主要是用来掩饰阶级差异。如果各个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消失的话，各个族群之间的差异也会随之消失<sup>1</sup>。虽然阶级利益冲突不能完全取代族群性这个因素，但它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同时，在“文化适应”的过程中，由于凉山州汉族与彝族之间的这种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平等以及存在于这个地方的族群偏见，使得“文化适应”这个过程并不具有对称性。在更多时候是彝族学生对中华文化表现出强烈的认同。但是，无论是家庭经济状况较好还是较差的彝族，无论他们有没有族群混合的经历，他们都保持着对本族群文化的认同，族际友谊、对异文化的了解和跨民族婚姻的分析就是例证。

#### 参考文献:

1. 林耀华. 凉山夷家. 商务印书馆, 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五月。
2. 马林英. 对凉山彝族婚姻文化的变迁考察, 彝族人网:  
<http://www.yizuren.com/plus/view.php?aid=8989> (17/05/2013)
3. 马戎. “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 少数民族问题的‘去政治化’”. 《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4. 马戎, 《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5. 斯蒂文·郝瑞著, (巴莫阿依、曲木铁西译), 《田野中的族群关系与民族认同——中国西南彝族社区考察研究》,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0。
6. 余伟、郑钢, “跨文化心理学中的文化适应研究”, 《心理学进展》2005, 13(6): 836-846。
7. David B., «le rôle des mythes d'origine dans la représentation des ethnicités han et zhuang en Chine du Sud », in *Journal des anthropologues*, 1998.
8. Denys Cuhe, 1994, "Le concept de "principe de coupure" et son évolution dans la pensée de R. Bastide" in P. Laburthe-Toïra (sous la dir. de). *Le réajustement de l'abîme*, Paris. L'Harmattan. 1994. p. 77.
9. Gernet J., 1968, article "Chine", *Encyclopaedia Universalis*, vol. 4, p. 263.
10. Max Weber, *Économie et Sociologie*(2), éd Pocket, 1995, p. 130.
11. Philippe Poutignat, Jocelyne Streiff-Fenart, 2008, Paris, PUF Quadrige, p. 119.
12. Thoraval J., *Études chinoises*, vol. X, n°1-2, printemps-automne 1991.
13. Thoraval J., «Le concept chinois de nation est-il "obscur" ? À propos du débat sur la notion de minzu dans les années 1980 », *Bulletin de sinologie*, 65, 1990, pp. 24-41.

#### 参考网页:

- <http://www.lsz.gov.cn/2011xxgk/next/e06b6b2b-1dd9-4dbc-941f-053e14900f47> (20/03/2013).  
<http://xc.lsz.gov.cn/shownews.aspx?id=39849> (20/03/2013).  
<http://www.scxxtx.cn/lsz/Template/12/detail.aspx?wid=2799&cid=20902&id=187732> (20/05/2013).

<sup>1</sup> Philippe Poutignat, *Jocelyne Streiff-Fenart*, 2008, Paris, PUF Quadrige, p. 119.

